

一、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會前觀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童涵浦主稿

- 習近平為延續其領導權威以培養接班人及比肩毛鄧的政治高度，「六中全會」通過新的歷史決議的可能性相當高。
- 「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等主張，會否在「六中全會」進一步闡釋，值予關注。

(一) 前言

從目前公開的訊息來看，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有幾點值得關注的重點：

對中共政治而言，即使從習近平 2012 年上臺以來已經不斷打破過去觀察家對於中共政治運作邏輯的看法，其中有些改變是否真的如此革命性，容或存在詮釋與辯論的空間，但明年習近平的去留則將正式為過去一段時間的論辯一錘定音。若習近平續留總書記，軍委主席或是國家主席，這便明確打破過去江澤民與胡錦濤十年兩任的作法。即使習近平離任，但他也有可能以某種形式（如恢復主席制）來繼續掌握權力。這兩種發展都意味著中共政治將邁入一個新的階段。鄧小平時代留下來的政治遺產，如集體領導與任期限制都將壽終正寢。鄧小平試圖解決的繼承問題也將重新出現。

問題的關鍵在於，習近平目前集中權力於一人的模式，雖然使政策推動的效率與力道得到極大的提升，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將整個政權的運作繫於一人將帶來幾個問題。首先，接班梯隊的設計與運作將無以為繼，因為無人能對何時接班形成合理的預期。過去如習近平自身在 2007 年 17 大之後便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擔任國家副主席。但現今在習近平的第 2 任即將結束之際，政治局常委中幾無一人在年紀上可以被視為接班人。若習近平如多數人所預期的那樣繼續掌權，中共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將面臨一個全新的政治賽局，無法得知自己接班的可能性與時間表。其次，繼承人的個人政治魅力與資本是否能與習近平相持？若差距甚大，此人能否服眾？中共的政治精英群體

是否能夠同意這樣的權力安排？從政治學對於威權體制長期發展的研究來看，個人式的威權將為獨裁政體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其中的關鍵正是在於，當強人不再，繼承者將無力維護前者留下來的政治框架，而其他精英在權力真空下對繼承者的鬥爭，將使政權陷入內鬥而無力發展。

（二）「六中全會」的會前觀察

從目前公開的訊息來研判，「六中全會」將延續強化的習近平大權獨攬政治發展方向，一個是持續強化黨建，另一個則是再度確立習近平的領導地位。具體而言，「六中全會」將總結中共建黨的「百年成就」。確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領導角色一直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方式。2020年9月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陪同下，在中共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發表的談話中，還特別強調了幹部對黨必須表示「敬畏」。其次，與此相關的是，更有傳言指出，「六中全會」可能通過第三項「歷史決議」。

在中共的黨史中，之前曾有兩份被尊為「歷史決議」的文件。第1份是1945年，在毛澤東主導下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份則是在1981年，由鄧小平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份文件對於確立毛與鄧在黨內的權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若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也通過一份新的「歷史決議」，這相當於將自己放置在與毛與鄧相同的政治高度之上。同時，由於前2份歷史決議都有撥亂反正的意圖，習近平現下雖無推翻過去改革開放成就的必要，但衡諸目前中共內外情勢，中共政權確實站在一個歷史的拐點之上。不論是外交上從「韜光養晦」到現在的「奮發有為」。還是內政上的「從嚴治黨」，習近平確實存在著重新界定中共史觀的意圖。

更重要的是，依照本文的觀點，習近平從2012年以來的集權，即使擺脫了之前九龍治水，派系之前相互掣肘的政治結構，卻也觸發了威權體制中最為脆弱的阿基里斯腱：領導人繼承問題。要解決此一問題，首先，習近平需要持續延續其領導權威以培養他滿意的接班

人。但更為關鍵的是，不論習近平在其健康無虞的情況下能持續執政多久，他始終需要交班，並且為之後的中共繼承立下新的規則。在中共完全無意推動民主化（甚至黨內民主）的前提下，此一規劃只有當習近平能夠達到毛與鄧的政治高度後才能成功。從上述兩點來看，習「六中全會」上通過新的歷史決議的可能性相當高。

（三）結論

除了政治層面的議題之外，另一個「六中全會」十分值得關注的焦點則是近來中共所提出的「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等主張，會否在「六中全會」得到進一步的闡釋。事實上，雖然這是偏向社會經濟的政策，但此一政策方向卻與習近平上臺後的政治邏輯若合符節。從早先的反腐運動，扶貧攻堅，再到目前的共同富裕，習對中共政權正當性的思考一直是如何透過抑制精英的權力來從群眾中得到更多的支持。這與改革開放以來重成長輕分配的政策風格迥異其趣。如果說改革開放時代的政治穩定，得益於政治精英對於權力於資源分享的共識，習近平所開啟的時代則是以平等與反腐之名來抑制菁英發展，並從一般民眾獲取正當性為主軸，即使這也同時意味著更為緊縮的社會控制與諸多自由權利的喪失。

最後，「六中全會」的發展也與未來的美中關係息息相關。即使美中間的衝突很大比例來自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增長，但之前的和睦也同時得力於鄧小平設計的集體領導，讓美國與西方的政治菁英對中共的政治穩定以及對改革開放的承諾抱持著相當的信心。在 2012 年習近平上臺並且逐步擴權，打破集體領導的政治格局後，西方政治精英很快意識到中國大陸的轉變，並且在集權的趨勢下，他們也逐漸失去對習近平的信任。因此，若「六中全會」果如論者所料，成為習近平第三任任期的最後一哩路，之後的美中關係難有樂觀的發展。